

变动时代的知识、 思想与制度

Biandong Shidai De Zhishi Sixiang Yu Zhidu

——中国近代教育史新探

■ 左松涛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变动时代的知识、 思想与制度

Biandong Shidai De Zhishi
Sixiang Yu Zhidu

——中国近代教育史新探

■ 左松涛 /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动时代的知识、思想与制度/左松涛著.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430-6487-4

I. ①变… II. ①左… III. ①教育史—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G5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4985 号

著 者:左松涛

责任编辑:李艳芬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8.375 字 数:189 千字

版 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自序

按照现行的学科分类，本书各章所论当属于中国教育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范畴。然而，早在就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期间，到了要撰写硕士论文的毕业时节，我就觉得它不能“仅仅是一篇有关于近代教育史的学位论文”。但为何立论不能仅仅按照一般通行教育史的做法取径，彼时只有模糊感知，谈不上学术自觉。

随后有幸负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师从桑兵教授问学，始得冰释心中疑惑，放下无谓纠结。彼时老师正组织学人从事于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我由于对教育史事相对熟悉，故而选择这一领域用力。经过数年学习与观摩，对既往研究的不足之处在方法论上有所认识。

首先，不可受分科治学的视野局限，应以整体联系的眼光在具体时空理解前人前事，所见庶几不至于盲人摸象，各持一端。略举一事说明，有人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发现了一份题为《总理轶事》的新文献，系民国时人名“糊涂翁刘云山”者提供的口述史料，证明孙中山在一九零六年到过首义名城武汉，且欲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有所往还。之前史学界一般认为他一生只有两次来过武汉，一是在一

八九四年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到武汉观察“长江之形势”；另一次则是一九一二年四月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访问过武汉。此事蹊跷，虽史料制作者、发现者都倾向孙的一九零六年之行可信，但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却通过考证手段证明史料所记为子虚乌有。然而，若是学者对近代话剧史、报刊史事有所了解的话，则似可不必经过繁复的考辨，就会明白此系当事者是将形似孙中山的藤堂调梅（任文毅）误认。任文毅，亦名任天知，是中国近代话剧的先驱人物，对革命主张也有所宣传。此人在清末入籍日本，且与当地女子结婚，入赘藤堂氏。这年正好回到中国，试图在官场活动谋事，寄寓北京中华报馆时被北洋侦探错认，密告“孙文到京”，予以逮捕。事情原委当时在《香港华字日报》就详细报道，一九一三年《中华报》的主办者彭翼仲撰写的《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也有所说明。这份由糊涂翁刘云山提供的口述史料自然不能证明孙中山的活动，但对于说明藤堂调梅在武汉的所作所为却是不可多得的真史料。这就提示，若视界放大就不能简单用真伪与否来判别史料价值，所谓的假材料也可说明真问题。

其次，不可用后来外在系统观念条理解释固有材料。应注意由于思想认识的变化，造成知识层累，进而形成规范认识，制约后来者对前事的研究。今天中国大学教育学科系的知识观念，包括教育史在内，追溯学问源头，多是在清末时从域外引进而来，当时主要目的在于使学堂的学生短时间掌握教育理论与方法，解决当时严重的师资匮乏问题。原本就存在先天不足，再加上急切致用的心态，往往以学问为宣传手段。一九三一年，陈寅恪评点国内诸学科之进展优劣时，对教育学评价甚低，认为学术性严重不足，教育学者只与政治相通。众所周知，五四时期的那一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有着严厉的批评。有些观

念或出自于爱之越深，责之越切。何况他们本来就有相当的中国学问功底，在深入堂奥之后，借助外来的新知识，更易反击倒戈。但是，他们对过去中国历史的解读也不尽全面客观，有时不免将真迹放大，将部分材料事实夸张处理；有时则有心立异，故意作惊人之论，以引起社会舆论重视；有时也有意无意戴上外来的有色眼镜，看朱成碧，扭曲对中国固有制度与人事的认识。同样在一九三一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敬恒）撰文谈自清末三十五年来民众教育，吴稚晖的回答就是这个题目要另请高明。因为他到此时都没有弄清民众教育是什么东西，也是到了民国成立之时，才注意到了教育部的分司职掌有所谓专门、普通与社会教育的不同。若用民众教育等一类名词，再加上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脱产教育与非脱产教育这样的后来观念，区别、理解与论说晚清以前的教育历史，难逃强古人以就我的嫌疑。在耳学远胜于眼学的当下，应尤其警惕其中流弊。

职是之故，本书致力探讨晚近中国教育史研究中较少论及的一些面相，例如清代社学、义学的设置，晚清民国所谓“私塾”问题的产生、塾师的社会地位问题等。也注意对相关典章制度及其实施情况的史实重建，诸如生员进学年龄的大小，中央一级学务处的设置与否，清末新式佛教社团组织的兴学活动等等。还有意研究教育与政治、社会变迁等交相关涉的具体史事，例如武昌自强学堂的师长一辈与辛亥革命的渊源关系，华中大学（民国时期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之一）的学生运动等等。

应该声明的是，学术重在先因后创，忌讳不破不立，虽各章所论对既往研究有所辩难，号为新探，实基于前人探索展开。鄙意以为，

这是对前人严肃研究的最好回应。但由于个人手眼不到之处甚多，有些问题受制于史料局限，研究颇为棘手，加之对各位学术先进的成果理解也可能不尽符合原意，造成误读误判。尚祈请读者高明指正，以便日后修订。二零零九年，我以“近代史上的私塾与学校竞争问题研究”一题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如今研究工作已进入尾声，但由于相关的规定，未能将最近的个人心得编入本书。“私塾”问题的论说丰满，当有待个人早就着手计划却又迟迟拖延未成的另一部专书进行论述，谨此一并说明。

近读昔年黄潜（字秋岳，号哲维）为齐如山著《京剧之变迁》一书所作之序，不免感叹，以为这篇自序的结束。黄氏称许此书对京剧历史的叙述是“如探源星宿，虽错落千门，而有条不紊。凡京剧之本，一一爬梳呈露，尤妙者无一粉饰语，无一模棱语”。我想在史学研究中能够实现“无一粉饰语，无一模棱语”，这是何等高明的学问圣手才能达到的天地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目录 CONTENTS

自 序	1
第一章 风化遐荒：清代边地社学、义学之设置	1
一、政策演变	3
二、相关制度	8
三、余论	12
第二章 少年英俊：清代生员进学年龄考论	16
一、研究方法讨论	17
二、相关统计分析	22
三、影响年龄诸因素	27
四、生员进学年龄与教育普及之关系	37
第三章 新词故物：清代“私塾”再认识	40
一、旧词新义	42
二、私塾真貌	55
三、私塾与教育普及之关系	64
四、小结	74
第四章 并未失语：晚清民国塾师地位问题初探	77
一、改良话语下的私塾	78

二、塾师地位变与不变	85
三、小结	90
第五章 有无之辨：清末中央设置学务处史实考	93
一、学术公案由来	93
二、学务处实设之证据	98
三、学务处的相关史实	103
第六章 旧官新制：清末撤废学政与新设提学使	110
一、撤废因缘	111
二、兴革经过	115
三、抵制新官	123
四、余论	127
第七章 师辈异动：武昌自强学堂师长与辛亥革命	133
一、张之洞宽容反清	134
二、钱恂有意反清	143
三、小结	148
第八章 穷则思变：清末佛门兴学史事考论	150
一、南北共起	150
二、成败因缘	156
三、小结	162
第九章 感时忧愤：吴雷川与非基督教运动	164
一、对科学冲击宗教的回应	166
二、对民族主义挑战宗教的回应	170
三、对收回教育权要求的回应	175

四、小结	178
第十章 与时俱进：私立武昌华中大学的学生运动	182
一、文华书院时期	184
二、早期的华中大学	187
三、从重办到抗战时期的华中大学	190
四、抗战结束后的华中大学	194
五、制约学运的诸种因素	201
六、小结	205
结 语 晚清民国学人对新式教育之反思	209
一、王国维的议论	211
二、康有为与章太炎	216
三、民国的新学人	220
主要征引文献	230
后 记	252

第一章 风化遐荒： 清代边地社学、义学之设置

在中国传统教育统系之中，社学、义学与学校、书院的分工有所区别。清代学校由朝廷与各地官府开办，在京师设立国子监（国学），直省则按照行政区划分别设置府学、州学、县学、卫学。此外，京师及八旗驻防也设有各种官学教育满洲、旗人子弟。清代书院的设置则类型多样，难以一概而论，官立、公立、民办或多种情况的混合均有，教学的程度也必须具体分析。但一般而言，学校、书院对有一定学养者进行高深教育，积蓄资治人才，是“以育成才”，甚至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社学、义学的设立情况与书院类似，但重在推广教化，以使得民间形成良善风俗，教学对象多是凡夫俗子，甚至是具有特定身份的生徒，重在养成，即所谓的“以端蒙养”。

对于中国传统固有教育体系，今天学者多以近代以来根源在外的观念系统进行条理归纳。一般认为，清代的社学、义学对应为现代的小学之类的机构。学人视其为初级蒙学，并对明清两代

是否存在一个“官办的正规的初等教育体制”有所争议。^①这种做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难以将既有史事材料安放妥帖。相关的学术争论提示用外来架构剪裁固有史实，不仅导致扭曲前事，也可能湮灭前人设立制度的精义。本文认为，对于社学、义学不能简单套用现代教育系统层级予以对应，而且这类学塾也并非是单纯的启蒙教育（固然可能有训蒙的一面）。清代的朝廷、官府与民间组织设置社学、义学，除对民众提供一般的识字教育之外，更意在维系风化，可以说是一种治理策略。尤其是在边地所设置的社学、义学，更多是出于笼络人心，培育文化认同，维系朝廷统治的政治需要。考察清代边地设置社学、义学的相关史事，或有助于今人对中国旧有教育制度的重新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社学、义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两者曾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前者的官办色彩相对强烈，一度被视为基层的学校，后者多具有公益性质。但在实际运作之中，清代的社学、义学彼此混称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还有以“书院”名之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河南临颍县知县沈近思路过本县葛冈村，有人以为“斯地朴鄙，望设义学以教之”。沈近思同意了这一建议，捐资办理，“无几日而义学成，予颜之曰：葛冈社学”。^②可见在这一时期，义学与社学就已经没有根本区别了。乾隆朝以后，

① 陈剩勇：《清代社学与中国古代官办初等教育体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王日根：《“社学即官办初等教育”说质疑》，《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本书对于争论的看法，详见第三章。

② 沈曰富编：《沈端恪公年谱》卷上，光绪年间刻本。收入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9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影印。

社学、义学更多不加区别的使用。在有些地区，不太使用社学名称而偏用义学一词，可能与清初盛行的文字狱有关。道光《济南府志》卷十七中详细记载本地学校、书院及义学，“惟社学不载”。原因是“以卧碑有结社之禁”。

一、政策演变

一般认为，社学创始于元代。当时朝廷曾规定每乡五十户立一村社，每社设学一所，农闲时节令子弟入学。明初，朝廷设置社学的理想一度高企。皇帝朱元璋设想不管在城在村，各地“但有三五十家，便请个秀才开学，教军民之家子弟入学读书”。^①但是，在上者虽有热情而在下者却漠然视之。据说实行的效果是，穷人子弟忙于谋生，没有入学需求，却被逼令入学，而富豪之家有钱有闲，却又故意放纵不学。朱元璋对此亦无可奈何，只得感叹“好事难成”。不过有明一代的社学并未停辍设置，旋起旋灭，此毁彼兴。清承明制，除继续在内地设立社学、义学外，特别注意在满、蒙及边地区域设立社学、义学。概言之，顺治、康熙两朝是边地设置社学、义学的初始阶段，雍正、乾隆两朝是扩展与形成定制阶段，道光朝之后，社学、义学设置逐渐废弛，在一些地方还成为团练等地方武装的代名词。光绪朝时期，设学一度复兴，但最终昙花一现，随清末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而相应遭到废止。其政策变迁大略如下：

^① 弘治《抚州府志》卷一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

顺治朝已见有在部分边地设置学舍的政令。《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一一〇记载，顺治十四年（1657年）七月，朝廷复设广东雷、连各瑶峒社学一所，设置教读各一名。《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十五年，朝廷题准：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令立学一所，行地方官取文理明通者一人，充为教读。

康熙朝时期，在台湾、贵州、广西等各族群聚集之地推广设置社学、义学，对生徒、师资的身份要求相对较高，设置数量或较有限。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的郑氏政权归顺清廷。次年，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在府城内设置社学两所。二十八年（1689年），台厦巡道王效宗设立社学一所。此后，台湾府属各地多有设立社学、义学，诸罗县最早设置土番义学。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攻占贵州。康熙初年，可见在毕节、石阡府等地设立义学的零星记载。四十四年（1705年），贵州巡抚于准题请在本省各府州县设立义学。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此时义学录取对象主要是各土司承袭子弟及族属人等，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可送入。这是贵州大规模设立义学的开始。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议准在广西十五处土属各设义学一所，土属子弟在就近流官州县附考取进。学额由巡抚报请朝廷酌情确定，规定塾师教学效果优秀者，由巡抚保荐、议叙。

雍正朝时期继续执行前例。由于“改土归流”推行，朝廷对在边地推广设置社学、义学更为重视，大体形成定制。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在八旗左右两翼公所各立义学两所，八旗人内家贫不能延师者可入学。四年之后又添设四所，增设满汉教习十六人。次年，在满洲、蒙古每参领之下又各设学一所，十二岁以

上幼年男丁入学。三年（1725年），清廷议准在云南威远设立义学，彝人子弟有志读书者，入塾诵习。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准许苗人子弟愿意读书者赴各该管官报名入学，由学官督查。五年（1727年），朝廷允准为云南东川府土著设立义学。塾师在本省贡生、生员中选择，标准是熟习风土，品学兼优。若教化有成，由督抚奖赏。八年（1730年），制定边地义学成效考核制度。朝廷意图以义学肄业之熟番教授生番，以使“生”变“熟”，而“熟”成“民”。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题请，新设乌蒙府之前从无学校，应设立义学。以六年为考核期限，如教导有方，担任塾师的生员准作贡生。三年无成，另行择师。苗人子弟的读书费用向布政司请领转给，通晓文义者送入学政衙门考试，酌取入学名数。^①同年，朝廷从巡抚宪德所请，以四川建昌府民族人民“未知礼数，应延塾师训习。但蛮童不解官语，塾师不能译语，训习似难遽通，应于汉境内，择大村大堡，令地方官照义学之例捐建学舍”，先选取本省文行兼优者为师，“俟熟番子弟学业有成，令往教训生番子弟。”^②以本族之人教授各义学之事，始见于雍正十年（1733年）。这年朝廷从湖南巡抚赵弘恩所请，在永绥六里每里设立义学两所，让苗童入学肄业。每所延师两人，在乾州、凤凰两厅的苗生之中选择。^③十一年（1734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在广东韶州府曲江等县，连州及所属阳、莲二县

① 《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九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2页。

② 《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九〇，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5页。

③ 恭阿拉等纂：《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四。收入故宫珍本丛刊第334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

各排瑶人聚集处设立瑶学，拨公项延请塾师。据称该地瑶人踊跃入学。十三年（1736年），清廷议准，广东省凡有黎、瑶人州县，依照连州事例，多设官学。以后诸朝，多援引雍正朝之例，在边地推广社学、义学。

边地设置社学、义学，未必都能顺利达到朝廷希望消泯边地族群“犷悍之气”之目的，朝廷亦对某些汉人与这些族群联系紧密有所警惕，恐对其治理不利。因此朝廷对在部分地区设置社学、义学一度消极，雍正帝、乾隆帝都曾下令裁撤某些地区的社学、义学。雍正五年（1727年），署广西巡抚甘汝来奏请令各土司延请塾师，设立义学，遭到上谕驳斥：“汉人中读书自好者，未必肯为土民之师，将来桀黠无赖之徒，略识数字，借名为师，益得肆其煽惑，貽患滋深”，“土民愚蠢性成，惟在地方官约束严明，使知畏威戴德，庶可收革面革心之效。乃欲以《三字经》、《千字文》之类，谓可使之明义理，而消凶恶，亦迂阔之甚矣。”^①乾隆十四年（1749年）五月，上谕认为番苗均属化外，不必建学延师，使知书文。应因其俗，以不治治之。次年，广西各属苗壮义学七十九处全部停办。十六年（1751年），贵州苗疆社学也停办或者逐渐裁撤，“所设社师，已满三年者，均以无成淘汰。未满三年者，届期亦以无成发回，渐次停撤。”^②二十三年（1758

① 《雍正朝起居注》，雍正五年九月初七日，第1088页。本书使用的清朝起居注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多利用“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检索阅读，谨致谢忱！

② 恭阿拉等纂：《嘉庆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四。收入故宫珍本丛刊第334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

年），还发布上谕裁撤了八旗、汉军义学。

虽然经历波折，在乾隆朝后期，被裁撤的边地社学、义学又逐步复设。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多见朝廷、直省及地方官员倡设社学、义学的谕令。但从地方志记载的情况考察，内地新创社学、义学却有减少趋势，旧有社学、义学却逐渐废弃。边地的社学、义学情况或大体相同。清朝从盛世逐步走向衰落，其间发生的全国规模性的民变深刻地改变了社学、义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或是最为主要原因。光绪朝初期，社学、义学有所兴复。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御史章乃畬奏请朝廷飭令各地举办社学。奏折援引顺治九年、雍正二年之例，说明社学对安定人心的重要性：“如各乡设立社学，则民之就学者必多，……庶乡曲小民咸知礼法，不为邪教所煽，风俗可期醇美。此社学之效也。”由于太平天国及各地民变基本平息，“现当军务久平，正宜休养生息，与民更化。朝廷良法，自当实力举行。”^①上谕允准章乃畬所请，要求各省督抚转饬各州县查照旧章，一律兴修。影响所及，在新疆、甘肃、黑龙江等省都开设了许多新的社学、义学。次年左宗棠即报称，新疆兴建义塾 37 处，多有回民子弟就读。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九七记载，到光绪十年（1884 年），新疆义学有 77 处。

但是好景不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科举停废，对边地的社学、义学影响颇大。此前一年，朝廷公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规定，各省府厅州县原有义塾、善举等事经费，皆酌

^① 光绪朝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 03—7208—031。